

恭王府康熙御笔“福”字碑历史钩沉

●张军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里，有一块康熙的御笔“福”字碑。恭王府不缺与“福”有关的建筑和景点，如多福轩、福镜楼、蝠(福)池、蝠(福)殿等，唯独这块“福”字碑比较特别。

此“福”字碑深藏花园滴翠岩下的秘云洞内，碑身長129厘米，寬54厘米，碑面正中是一个字徑59厘米x33厘米的“福”刻字，“福”字正上方刻有“康熙御笔之宝”。整个“福”字，笔意纵横，圆润中透着古朴、苍劲，是康熙帝难得一见的大幅榜书。据清史专家说，清朝皇帝中，康熙皇帝的书法水平算是高的，且善书大字。嘉庆、道光年间，做过御前侍卫，自称“天下第一废物东西”的庄王府裔奕奕，在其《佳梦轩丛著·东华录续言》中形容康熙御笔的“清、慎、勤”三个二尺大字是“神气尊严”，他自己就收藏有一幅拓版。

从古至今，中国人向往福、追求福，也好书“福”字，形态往往各异，有人统计“福”字书写法超过100种。但恭王府花园秘云洞内的“福”字，却与众不同，独具个性，其最大特色是字形结构特殊，字里充满着吉祥富贵之气。有民俗专家解读说，此“福”左边似“子”似“才”；右边似“寿”，“寿”字上部似“多”，下部似“田”，综合起来表达的是多子、多才、多田、多寿、多福的寓意。

康熙为什么书写这样一个“福”字？民间



恭王府“福”字碑。

李韵摄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代皇帝书写的“福”字。

李韵摄

传说是康熙帝为病重的祖母孝庄文皇后祈福而写，是否属实尚不能确定。不过，清朝的皇帝是乐于写“福”的，尤其是新年的时候。据清礼亲王王府后裔昉珪在《啸亭续录》里记述：“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福寿寺，御建福宫，开笔书福字笺，以迎新禧，凡内廷王公大臣皆遍赐之。翼日，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出之，以志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藏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御前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云。”昉珪所说的定制，主要是指乾隆朝，其实清朝皇帝过年书“福”，始于康熙，雍正效仿后才渐成定制，乾隆自己也说“每岁嘉平朔开笔书福，以赐王公及内外大臣，盖敬遵皇考时成例也”。皇帝书福开笔用的是康熙留下的“赐福苍生”大笔。

关于康熙御笔的“福”字与恭王府的关系，社会上流行着这样几种说法：有说是恭王府最初的府主和坤从宫里偷来的；也有说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辅仁大学移来的；更有甚者说是恭王府管理者为营销“福”字文创“自造”的。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拨开迷雾的最好办法是用相关的历史材料来证明。

直接的证据乃是1938年左右的“福”字碑文字记述和照片。文字和照片产生于恭王府产权刚变更不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恭王府被府主小恭王溥伟抵押给有天主教会

背景的包士杰。1936年溥伟病死，包士杰为讨回借款提请拍卖恭王府，1937年辅仁大学购得了恭王府产权。1938年居住在花园的溥伟迁往颐和园后，花园也归辅仁大学所有。

辅仁大学拥有了恭王府邸和花园后，并没有立刻用作校舍。在对恭王府改造前，有两拨人对恭王府很感兴趣，一是以梁思成为首的营造学社，二是当时的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鸿铨和美国汉学家凯茨等人。陈鸿铨、凯茨参观了府邸各殿堂及花园，并拍了很多照片，之后合写了《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园》一文，1940年发表在辅仁大学创办的西文汉学研究期刊《华裔学志》上。根据文章内容，他们应是1938年左右来到恭王府的。文中有关于秘云洞“福”字碑的简短记述：“洞穴深处，有一块精心润饰过的石块，面向南，嵌入天然墙，上面刻着一个大字‘福’，系康熙皇帝的手书，盖有皇帝的御印。康熙御笔难得一见，这与其多数子孙如乾隆皇帝等形成强烈对照，因此，这个清晰的铭刻非常珍贵。”2005年陈鸿铨女儿陈岚女士获悉恭王府邸修缮需要老照片后，捐赠了65张当年她父亲拍摄的恭王府照片，其中就有“福”字碑照片。对比碑位，“福”字，与现在无异。陈鸿铨和凯茨看到的恭王府，是辅仁大学刚刚购置不久，还没有进行改造的恭王府，基本是恭王府主人最后撤出时留下的原貌。还有不少照片也能证明辅仁大学尚未对恭王府进行改造。比如府邸中路嘉乐

堂，曾是王府的祭祀场所，陈鸿铨、凯茨拍照时还能看到祭祀用的锅灶，后被辅仁大学拆除用作礼堂。反过来想，辅仁大学刚刚获得花园就在秘云洞内凿刻石碑，有什么必要呢？因此，基本可以确定康熙御笔“福”字碑是清代的恭王府遗留下来的，辅仁大学移来和恭王府管理者“自造”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

此“福”字碑既为恭王府旧藏，源自哪位府主呢？不妨从碑所在花园的历史谈起。恭王府花园现在的格局，乃是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奕訢在原来王府旧园的基址上新落成的。这样看，奕訢搜罗来的可能性很大，毕竟彼时的恭亲王位高权重。有一则材料也易让人产生联想。奕訢有一同僚兼好友，名宝璠，字佩蘅，长期与他共事于军机处。光绪十年(1884)“甲申政潮”时，二人同被慈禧皇太后开缺，闲居期间经常以诗唱酬。光绪十二年(1886)的某天，奕訢邀宝璠来恭王府花园饮酒赏剧，第二天又专门赠送了一幅“福”拓字。宝璠深受感动，写下《恭邸以彩笺见召次日复以仁皇御帝书福字朱刻见赠情文斐亶感极志谢》诗，并专门辟室悬挂。宝璠在诗里提到此“福”字是圣祖仁皇帝“赐福苍生”笔所写(《文靖公遗集》卷八)。宝璠得到的恭亲王奕訢赠送的“福”字，既是康熙御笔，字义又很特别，且是拓的，不由得让人想到秘云洞内的“福”字碑。退一步讲，秘云洞内如果空空如也，似乎不太符合中国人“洞天福地”的造园意境。

“福”字碑在奕訢时期的存在，并不能完全排除恭王府首任府主和坤或第二任府主庆王永璠收藏的可能。因为奕訢建园之前，府邸后面是有花园的。前任的花园旧物，奕訢接着用也合情合理。道光三十年(1850)奕訢分府所得的马圈、祠堂、铺面房就是传自永璠，永璠得自和坤。

清朝皇帝御赐的“福”字，有御笔书写的，也有“御笔勒石”的，恭王府里的康熙御笔“福”字，究竟是哪位府主以怎样的方式得来，尚需要进一步的证据。不管最终的历史真相如何，此“福”字碑都已在恭王府的花园内默默矗立了上百年，早已成为恭王府的“镇府之宝”。现在，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因“福”来到恭王府祈福求福。同一个“福”字，见证了古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不可当儿戏。否则，如果常常喊口号、定目标却不动行，难免会落入志大才疏的窘境。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写道，“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无闻，虽乘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如果志向不坚强，意志不是充满正气，就只能被俗务困扰束缚，成为平庸之人。

同志曰友。人们最向往的，莫过于共事的人志同道合。共同的志向，能够把人们凝聚在一起，汇聚出强大的力量。邓拓在《说志气》一文中曾写道：“这样的雄心大志，绝对不能只是一个人的志气，而必然是最大多数人的集体的志气。在这里，个人的志气和集体的志气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从每一个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树立雄心大志，并为它的实现而不怕一切困难，坚持奋斗。”

志诚君子

●张艺瑶

志诚君子，意思是志行诚笃高尚的人，常用于古代诗文中。古人把志行诚笃的人视作品德高尚的君子，可见人们对志行的珍视。

志，会意兼形声字。从心从之，之亦声。之，往也，表示心之所往为志，本意是意向、志愿、志气。志还表示“记”，指用文字或标记符号记录下来，也引申作名词用，指记号、标记等，又指记载的文字，还表示记在心里，如“永志不忘”。

从“志”的字义上来说，似乎我们常用的“志愿”“志气”等本义更为抽象；可观可触的“记号”“记载”等义项，反而成了衍生义。有学者认为，“志”是一个人思想精神的集中表现，因此就成为表明某一特征的记号，即标记、标志。

由此可见，人们之所以看重志，是因为志是思想精神的产物。我们常说“志气”，孟

子则对“志”与“气”作了区分：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在孟子看来，气是充盈体内的力量，而志就是这股力量的统帅，起着统领、导向的作用。孟子还说：“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认为，思想意志到了哪里，一个人的精气神就在哪里表现出来，所以说要坚守自己的思想意志，不要滥用自己体内的气。因此，只要确立思想，意志坚强，很自然地就会表现出充沛的精力及气力。明白了这一点，当我们看到面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总有人能

创造出奇迹时，就不足为奇了。

“志”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还是可以付诸实践的行动。“志”在古代用作动词时，表示的就是有志于、志向的意思。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自己十五岁就开始有志于做学问了。志也是一个逐渐的学习、修养的过程，它的意义不只在立志这个动作，而在于整个“志于”的过程，在“志”的指引下，事事皆可学可做、可追可及。

俗话说，无志者常立志，有志者立长志。一旦立志，就要铭记心中，并坚定去做，

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

●陈卫平

中医诊疗强调个体化。“望、闻、问、切”就是采集不同的个体信息，以便因人制宜。与强调患者的个体性相联系，《黄帝内经》还注重医者独自领悟的个人创见。所谓“独悟”“独见”“独明”，都在强调个人独立独特的创新。这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潜心思索而达到的，超越了通过口耳言传感知的知识，成为心领神会的智慧

研究中华经典古籍《黄帝内经》，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黄帝内经》突出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连续性

中医源远流长，商代发明了汤液，西周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春秋战国时期扁鹊提出“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

诞生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是先前医疗实践的总结。它用“黄帝”来命名，分为《素问》《灵枢》两大部分。每篇都以黄帝设问为先导，表示其思想源自上古时期。

在世界医学史上，古埃及及创造出辉煌的医学成就。从三部医学文稿(埃伯斯纸草文稿、史密斯纸草文稿和卡恩纸草文稿)可见一斑。但自埃及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其传统医学就被湮没了。

古印度医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如《阿闍婆吠陀》记载了77种病症，并开出对症药方，还出现了医学名著《舍罗迦本集》《妙闻本集》，但后来由于雅利安人入侵，古印度医学也逐渐消亡了。

古希腊、古罗马的医学曾经十分兴盛，提出了不少学说，如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说、盖伦的人体学说、亚里士多德的隐德来希生机论，还有《药理学》《医学百科全书》等问世。然而，随着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中断，其传统医学或被遗弃或散佚。

中华民族把黄帝视作文明始祖，以“黄帝”命名的典籍传存到现在，并仍然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的，只有这部《黄帝内经》。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原生文明，而且成为这个文明具有生生不息连续性的突出象征。

创新性

中医是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体系，《黄帝内经》最早也最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这种原创性具有世界上其他民族没有的独创性。在最初的先民生活中，医和巫是混同在一起的。医的古老写法“醫”，就反映了这样的状况。《素问·五藏别论》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这里的“至德”有两种解释：至高的医德或至深的医理。无论哪种解释，都表明《黄帝内经》将医学和巫术相区分。它的问世是冲破巫术鬼神迷信的重大创新。

中医诊疗强调个体化。“望、闻、问、切”就是采集不同的个体信息，以便因人制宜。《黄帝内经》认为，不同个体对同样的疾病反应各异，需要针对不同的患者制订不同的治疗方案。因而，每个典型医案，都在某个方面是有所创新的。

与强调患者的个体性相联系，《黄帝内经》还注重医者独自领悟的个人创见。《素问·八正神明论》说：“神乎神，耳不闻，目不明，心不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所谓“独悟”“独见”“独明”，都在强调个人独立独特的创新。这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潜心思索而达到的，超越了通过口耳言传感知的知识，成为心领神会的智慧。

这实际上是最高创新境界，即实现了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中医重视历代名医医方的整理研究，正是因为它们汇集了创新的智慧。

统一性

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经”的含义：“常也，法也，径也。”“经”是常道(基本理论)、法则(基本规范)、门径(基本方法)的载体。《黄帝内经》正是这样的中医典籍，由此被视作“医家之

宗”。它奠定了中医统一的遵循依据的基础。

《黄帝内经》之后，尽管中医著作不断涌现、学术代有发展、学派日益纷呈，但它们的源头无不出自《黄帝内经》。但中医并不把统一性变为单一性，视《黄帝内经》为定式教条。

事实上，《黄帝内经》赋予中医的统一性，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结合。前者从遵循基本理论、规范、方法出发，后者是各人在诠释这些基本理论、规范和方法时，把来自新的实践的新观点增添进去，于是就出现了新的著作、学说、学派。

一方面，《黄帝内经》确立的统一的基本理论、规范、方法，在历史中表现为多种学术形态；另一方面，多种形态使得统一的体系内容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完备、表述更加准确。

中医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东汉张仲景撰《素问》《九卷》(后者即《灵枢》)，又不“始终顺旧”，而是以辨证论治的整套原则，充实提高了《黄帝内经》的临床医疗体系。

此外，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都尊崇《黄帝内经》，但又各从不同侧面继承发展了它，将其建立的体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中医这种一展开为多、多归结为一的统一性，体现了“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

包容性

《黄帝内经》以“黄帝”为名，清晰表明它具有黄老之学浓厚的包容性思想品格。黄老之学源于老子、庄子，老庄主张对不同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

《老子》认为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相反相成，不同的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庄子》主张物论可齐，各种思想犹如百家众技，皆有所长。黄老学派的宋研、尹文还进一步提出“别囿”，即不要为某种思想所局限。

《黄帝内经》继承了这样的思想品格，包容了诸多学说。比如，吸取黄老之学以精气为天地万物本原的思想，把精气说作为阐述人的生命活动的理论基石；将阴阳说和五行说这两个不同系统有机联系起来，构筑了基本学术框架。

《黄帝内经》还传承了孔孟儒家仁者爱人的价值原则，以人



湖南省衡阳市石鼓区西湖公园的爱莲阁。李自强摄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从湖南回来后，一连几个晚上，总能梦见一池池莲花。那高洁的君子形象，到处刻印在以莲命名的亭台楼阁中，伴随着这篇《爱莲说》，又一同浮现在脑海里。

从长沙的爱莲广场到郴州的爱莲社区，从衡阳市石鼓区的爱莲阁到邵阳市的爱莲池、君子亭，处处都能感觉到“香远益清”的韵味，体悟千年前理学大师的思想。多少年来，古老土地上的人们以自己的感受去理解莲花，也在理解中不断塑造着高尚的人格。

作为中国传统民俗中常见的一种图像，莲花自古以来就受到无数人喜爱，不仅仅因为它的美丽，更在于它的不染尘埃、与世无争，有如谦谦君子。人们认为它是洁身自好的高尚品德的象征，并赋予它各种美称——荷花、藕花、泽芝、芙蓉、芙蕖、菡萏……每个名称都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美。

从古至今，人们惊叹于莲的清姿素容，将其形诸笔端。

古老的《诗经》里，已有关于莲花的描写。“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坡上有繁茂的扶苏树，池塘里有盛开的荷花，氤氲的荷香弥漫在四周的空气里。幽美的意境，体现出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莲有一蒂二花者称并蒂莲，象征夫妻恩爱，因此喜联常有“并蒂花开勤俭家”等句。莲谐音“廉”“连”，民俗有“一品清廉”“连生贵子”等谐音取意。

古人笔下的莲花，往往又是自身的写照。屈原在《离骚》中，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在屈原看来，有没有人理解自己，都不会在意了，只要心中馥郁的香气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对这个世界总会有一些影响。以荷为衣的屈原，他的灵魂也是散发着香气的。

给莲花注入更浓郁人文精神的，当属北宋的周敦颐。一篇《爱莲说》，刻画莲花高洁清廉的形象，赋予其中君子的人格内涵。“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相对于隐逸与富贵，莲花要求的是既要担当，又要保持气节，这种儒家的积极人世立场，周敦颐称之为君子。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因为一种植物，造就了一首名篇，成就了一个人。周敦颐一生清廉自守，服御之物，只一敝篋，钱不满百，旷然不以为意。周敦颐是湖南永州道县人，晚年寓居江西九江庐山山下，因此湖南、江西各有一条濂溪。“濂溪”就是“廉溪”，“爱莲”就是“爱廉”。“濂溪”“爱莲”的名号成为中国古代期许清廉政治的表现。

在周敦颐踏足过的地方，莲廉文化已成为一张靓丽名片。在湖南，我有幸拜访了濂溪书院。书院规模不算太大，却有环抱四方之感。公元1050年至1054年，周敦颐任桂阳(今汝城)县令，其间“风节慈爱，吏治彰彰”，并在此写下《爱莲说》《拙赋》等。周敦颐创立了理学理论基础，千百年来，汝城“士率其教，更思其德，咸怀其德”，兴建书院作为纪念。

漫步濂溪书院，更思其德，正道直行“池中莲花，确系君子情怀”“濯清莲守拙朴”……一副副关于“莲”的楹联扑面而来。在书院二层的一间展厅，我与一对父子不期而遇。这位父亲正带着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拍摄公益演讲短视频。他们说，尝试过不少其他地方作为视频背景，但都不满意，今天终于在濂溪书院找到了满意的。顺着镜头看去，小小演讲员的身后，正是一株亭亭净植的莲花图案。这真是令人欢喜的事情——人们在游中学、在学中悟，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被一朵莲花潜移默化地浸润到心里，一代代传承下去。

“绿盖半篙新雨，红香一点清风。天赋本根如玉，濂溪以道心同。”希望我们多去看看这不蔓不枝、小巧典雅的莲花，一解夏日困乏的同时，永葆和周敦颐一样的志趣——不慕繁荣，初心不改，尽得真自在。

的生命为天地万物的最高价值，强调“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把“别异比类”“援物比类”作为重要思维方法，显然是对《墨辩》“以类取，以类予”的运用和发展。

《黄帝内经》的包容性还表现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素问·气交变大论》就直言：“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黄帝内经》的医道具有长久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运用了天文、地理的科学知识和人事社会的知识。

《黄帝内经》赋予中医的包容性，在西医传入后依然得以保持与弘扬。由此，中西医结合很自然地成为中医界的共识。

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在《黄帝内经》中集中表现为强调“平”与“和”是人体健康的理想状态。

《黄帝内经》认为，人的健康在于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志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适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是达到阴阳的动态平衡。疾病的发生，是由于在内在外因素的作用下，阴阳失去平衡，因而治疗疾病就是使失去阴阳平衡的整体功能恢复到协调和谐的状态。

在《黄帝内经》之前，主要有《周易》和《老子》讲阴阳。前者主天尊地卑，即阴附阳；《老子》主贵柔守雌，即重阴轻阳。《黄帝内经》则进一步强调阴阳平衡，“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可以说，这一阴阳平衡的思想较之《周易》《老子》，更能代表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当然，《黄帝内经》更多是从医学视角论述“平”与“和”。《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内外调和，邪不能害”，即人体和外在环境相适应，就能阻止邪气侵袭健康。《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即治病必须要使作为人体生命内部原动力的气血达到和平状态。

在人与自然和谐、人体内部气血和谐的基础上，《灵枢·本藏》进一步提出比较全面的以“和”为核心的“人之常平”(健康无病)的标准，即“血和则经脉流行，营复阴阳”“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柔”“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以及“寒温则六腑化谷，风湿不作”。归结起来，就是天人、形神和、气血和。

《黄帝内经》充分反映了中华文明所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应当将其作为推进“第二个结合”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献词》的最后写道：“精神和自然，乃是您所信赖的神医。”这里的“您”是指燕妮的父亲。这篇博士论文反对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摆脱宗教对精神的束缚。因此，这句话可与广义地理解为自然和精神是人类的“伟大神医”。

这与《黄帝内经》所提倡的理念高度契合。《灵枢·营卫生会》强调“人与天地同纪”，要求以人体生理活动与自然规律相一致来护卫生命健康。《素问·上古天真论》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里，又进一步把精神健康作为抵御疾病的屏障。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传承和弘扬好《黄帝内经》的思想精华，是做好“第二个结合”学理化、学术化的一个可用抓手。